

近托派與 近代中國

一項政治文化史的考察

孫會修——著

目錄

導 論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002
第二節 中國托派小史	/005
第三節 學術研究現狀及本書努力方向	/008
第四節 本書研究方法及所用史料	/023
第五節 研究時段說明及章節設計	/026

第一章 托派的歷史演進：重要史實新徵

第一節 赤都裏的培育：莫斯科的中國學生反對派	/033
第二節 逆境中的努力：四派統一後至全面抗戰前的托派	/069
第三節 中央地帶的生存：四川地區托派組織的發展史 (1939—1952)	/093
第四節 最後關頭的掙扎：香港托派（多數派）的組織整頓 (1949—1952)	/124

第二章 托派的組織文化透視

第一節 民主集中制與中國托派	/147
第二節 「新青年」與「老幹部」：托派領導層的代際矛盾和組織演變 ——兼及托派在青年中的工作	/185

第三章 托派對中共、國民政府和蘇聯的認識與評論

第一節 不滿的批判：托派眼中的中共	/220
第二節 不斷的譴責：托派眼中的國民政府	/254
第三節 遠方的寄託：托派眼中的蘇聯	/280

第四章 托派與社會史和社會性質問題論戰

——兼論托派與新社會科學的關係

- 第一節 史料、史觀和史識：托派與中國社會史論戰 /310
第二節 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的托派
——兼論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學術批評的興起 /335
第三節 托派對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認識及與中共的論戰 /367

第五章 托派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展開與推進

- 第一節 李季《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與
早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 /390
第二節 托派與唯物辯證法論戰 /416

第六章 革命的「左」傾與托派的命運

- 第一節 綿延不絕的黨組織 /444
第二節 階級觀念與近現代中國革命 /448
第三節 學術、革命與政治 /451
第四節 「軍事化革命時代」的革命知識分子羣體 /454

附錄

- 中國托派大事簡表 /459

徵引文獻 /469

後 記 /485

導 論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革命是 20 世紀中國最醒目的符號，深刻影響着近代中國，它塑造了一個個新的價值系統、組織結構，也多次改變了中國人的社會文化觀念。學界對近代中國革命的研究已較為成熟，一般認為近代中國大約有三次大的革命：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及共產主義革命。同時應注意到，這種劃分容易遮蔽每次革命的豐富面相、革命主體的多樣性及革命勢力之間的複雜聯繫。比如，在民元前革命黨發動的較大革命行動即有十次，由同盟會、光復會等參與領導，即使武昌首義也有文學社、共進會等組織參與，這些革命團體之間有合作也有競爭，甚至互相攻擊，每次行動的形式、社會觀感及後續影響均不一樣，後世史家卻把這十次歸攏為一次整體的辛亥革命。這些問題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領域已得到逐步揭示，識者也易察覺和理解。但國民革命特別是共產主義革命卻有許多未知或並不熟知的面相，仍需要探索，相關問題的學術研究還有諸多不足。

有學者總結，近現代中國的革命存在「高山滾石」、累積繁衍、升級遞進三大效應。¹ 革命被賦予最高正義和排他性，革命進行之時，任何一方都強調唯己獨革、唯己真革。當一階段的革命結束後，勝利者往往會全方位否定所有的失敗者，並進行意識形態覆蓋，既有聯繫亦被割斷。這就使得一些革命勢力或人物「淡出」歷史，後世眼中的革命圖景殘缺不全。

學界目前對國共兩黨的研究已極為豐富，對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無政府主義派、民主同盟等革命次中心或邊緣政黨的研究也非常可觀，而中國托派則少人間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中國托派是號稱共產主義正宗的政黨，最早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自命名，在革命理論、方針和羣眾動員等方面與中國共產黨存在正面而持久的衝突。1952 年 12 月 22 日，公安部在全國範圍內肅托，托派被打成反革命。托派研究在中國大陸一時成為禁忌。二是自改革開放以來，雖有些學者對中國托派史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但總體而言，相關研究成果仍較為貧乏。另外，托派一直具有祕密小組組織的特性，其革命理論和中共的意識形態存有複雜關係，使得托派頗具神祕色彩；加之托派人物在歷史時期長期遭受諸多苦難，部分研究托派的學者或史學愛好者或多或少地對中國托派懷有同情之心，這種感情難以避免地夾雜在托派研究的成果中，影響了史學研究的學術性。這一情況在史料缺乏，沒有史實約束的情況下，會使負面效應放大化，甚至出現以想像彌補史料缺乏的情況。諸如此類情形，是促動本研究的原因之一。

當今中國已發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已成為世界上人數第一的執政黨，已能更加自信地看待自身的歷史，正因如此，中共黨史研究得到很大推進。新世紀以來，思想解放進一步深入，社會認識更加多元和理性，學界和大眾對認識和了解托派也有了更多的期待。同時，經過歲月的沉澱，絕大多數的中國托派人物已經去世，在世的人也沒有了得到「平反」的期待。這無形中讓中國托派研究少了「干擾」，有助於研究者更客觀地呈現托派史。也就是說，如今研究中國托派史，具備了較為成熟的條件。

本課題研究之於中國近現代革命史乃至整個近現代史研究均有意義。首先，托派的歷史境遇極為複雜，曾被打為「漢奸」「反革命」，但其中的部分人始終堅稱只有自己才是在從事真正的革命，對革命的追求

1 王奇生：《高山滾石——20 世紀中國革命的連續與遞進》，《新史學》第 7 卷導言，中華書局，2014 年，第 19 頁。

極為執着和純粹，其結果卻是自我孤立，使自己處於革命最邊緣。陳旭麓曾把近代中國社會喻作危崖轉石，「不達其地不止」。¹ 近代中國革命也可看作一個接近圓形的「轉石」。國共兩黨自然是轉石的中心，中心移動的軌跡決定着球體的前進方向和速率。而托派則處在球體的邊沿，和外界磕絆最多，在速率加快顛簸嚴重的情況下，甚至會被「磕掉」逸出球體。

托派老人向青生前告訴著者：「中國托派一直在革命的邊沿打轉，並沒有取得什麼成就」，² 此論頗有見地。不過，作為史學研究對象的革命邊沿之於中國近現代革命史研究卻極具價值，「邊沿」有助於界定邊界，無論這一革命邊界是「上界」還是「下界」，實則都能從側面幫助我們認知革命的廣度和寬度。某種程度而言，研究中國托派史能起到從邊沿觀察中心或整體的作用，彌補單面看山之不足，達到呈現歷史豐富面相之效果，有助於更為全面地認識中國革命史。

其次，以往的革命史研究，在較長時間內存在畛域自囿的情況，研究國民黨史不注重共產黨史，研究中央黨史不了解國民黨史、民國史的情況較為普遍。人類學家沃爾夫（Eric Wolf）認為人類社會沒有獨立於「我們的」之外的「他者」，「雖然有些社會對時間有不同的概念，可是顯然沒有任何社會是歷史之外的」。³ 實際上，中國近代史上同樣沒有任何獨立自在的黨派，各黨派無論勢力大小，均是民國時期的一個政治派別，體量再大都面臨競爭和攻擊，勢力再小都曾存在並影響過歷史。托派內生於中共黨內的路線之爭，成為獨立黨派後仍持續抨擊國共兩黨，與其

他黨派和中間勢力也多有往還，值得深入探討。

再者，進入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政治思想史光譜更為複雜，學術思潮競相奔湧，托派是其中最為複雜者之一。新文化運動使傳統文化備受衝擊，政治思潮變得更為激進。在這一過程中，國共兩黨既順應時潮又推波助瀾。源於蘇俄的「左」「右」劃分法具有無窮魔力，「左傾」「右傾」「左派」「右派」風靡時代。¹ 按照中共的劃分，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總體上是右派，但其黨中還有「左」「中」「右」派之分，且根據表現可隨時「換派」，足見這一劃分具有極強的相對性和隨意性。一般而言，中共和托派在民國被視為「左派」，而托派卻認定前者代表小資產階級，屬於「右派」，只有自己真正堪稱為「左派」，連其組織也命名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可見托派當屬最「左」的派別。同時，托派又極為反感被稱為「極左派」，組織內部論爭也常以「極左派」為武器打壓對方。以此可看出，「左」並非僵化生硬的標籤，而是有着豐富的內涵。研究中國托派，有助於集中透視近代「左派」思想史、激進主義思潮史，揭示其獨特的政治文化。

第二節 中國托派小史

中國托派源於 1920 年代的莫斯科，因聯共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黨爭而生。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1940）富有才情，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深厚，在十月革命前後是俄共（布）黨內僅次於列寧的人物，是蘇俄紅軍的創始人，在蘇俄和共產國際曾廣受愛戴。1923

1 陳旭麓：《關於中國近代史線索的思考》，《歷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第 68 頁。

2 「向青訪談錄」，孫會修記錄，2014 年 12 月 2 日於香港。向青（1922—2022），真名林尉都，黨名馬基，廣東信宜市人，著名教育家林礪儒之子，1937 年底開始接觸托派資料，1939 年考入西南聯大，兩年後在該校肄業，1947 年畢業於廣西大學，之後到香港並加入托派，1950 年前後是托派多數派（中國革命共產黨）廣東省委委員。

3 [丹麥] 克斯汀·海斯翠普編、賈士衛譯：《他者的歷史：社會人類學與歷史製作》，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 2 頁。

1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華文出版社，2010 年，第 73 頁。

年，「聯共（布）的隊伍中產生了反對派」，¹「反對派」即托派。托洛茨基及其追隨者與當權的斯大林派在列寧逝世前後圍繞最高領導權展開了激烈的爭奪，但他們一直處於下風，鬥爭也進一步加劇。1926–1928年，托洛茨基及同盟者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與斯大林在政策方針和組織上展開不斷的鬥爭，「托季聯盟」最終失敗。1929年初，托洛茨基被逐出蘇聯。托氏在流亡之後繼續領導追隨者進行鬥爭，建立了國際性的托派組織，在英法德等歐洲主要國家，以及美國和中國等國均建立了支部，並於1938年在巴黎成立了第四國際。力量弱小是各國托派普遍的特點，如美國托派在1940年前後一度是世界托派運動的中心，但在1938年的高峰時也僅有2000人左右。²即便如此，蘇聯仍不遺餘力地鎮壓托派勢力，1936–1938年的莫斯科大審判，蘇聯境內的托派力量被徹底消滅，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本人被蘇聯特工暗殺於墨西哥。此後，國際托派在困境中一直綿延發展，直至今日。

中國革命問題是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爭執的關鍵問題之一，使得中國托派的發展與國際托派的命運更為貼近。托洛茨基很早就反對中共加入國民黨的國共合作，中山艦事件後又反對遷就蔣介石，後來還反對共產國際支持汪精衛等「資產階級左派」執掌的武漢國民政府，每一次結局都驗證了托洛茨基路線的正確。大革命結束前後，許多在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在彷徨中認識了托派理論。預測的「魔力」使得眾多中國留學生轉為托派，莫斯科中國反對派最多時有150–200人，在中共留蘇學生中佔比較大。隨着蘇聯當局鎮壓留學生中的托派，部分留學生返回中國。

中國托派經歷了中共黨內反對派到黨外反對派的過程。他們起初試圖在中共黨內發展力量以改造共產黨，但被中共中央發現並被驅逐出

黨。1928年初，歸國托派開始着手建立組織。1929年初，史唐、陸一淵、張特等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托派組織——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即「我們的話派」。很快，陳獨秀、彭述之等原中共核心領導人也轉入托派，他們在1929年12月成立了「無產者派」。1930年1月，劉仁靜又糾集王凡西、宋逢春等人成立「十月社」。此後，王平一、趙濟、劉胤等人又組織了「戰鬥社」。在托洛茨基和陳獨秀等人的努力下，1931年5月，托派的四個派別在上海合併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陳獨秀任書記。不過，四派統一後不久，中央機關屢遭破壞，眾多領導人被捕。1932年10月，包括陳獨秀在內的五個中央常委全部被捕，使托派陷入更加困難的境地。此後，中國托派在組織上一直紛亂不斷，劉仁靜、任曙、劉伯莊、陳其昌、斯朝生、彭述之、鄭超麟等人曾先後成為領導過中國托派的人物。

中國托派組織發展極為緩慢，中央機關在抗戰前數次被國民政府破壞，一直沒有走出祕密小組的狀態。同時，托派也是一個理論訴求較強的政治派別，在組織內部關於理論和路線問題的論爭不斷，成為一個「吵鬧俱樂部」。1938年始，托派內部在抗戰問題上產生巨大分歧，最終分裂為以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多數派」和以鄭超麟、樓國華、王凡西為首的「少數派」，前者主張在抗日的前提下反對國民政府，後者認為抗日戰爭是帝國主義間的戰爭，應實行革命的失敗主義。「多數派」於1948年建立「中國革命共產黨」，「少數派」在1949年建立「中國工人共產黨」。1952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統一「肅托」，托派遂在大陸消失，組織轉移至海外。

中國托派以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論述為核心綱領，構建中國「不斷革命論」的理論體系，認為中國已是資本主義社會，革命性質屬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無需先完成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再進行無產階級性質的革命。托派認定自己不是一個「民族黨」，而是秉持馬克思主

1 [蘇聯]拉狄克：《關於反對派》，1926年8月，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9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50頁。

2 曾森：《世界托派運動——組織、理論及國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頁。

義階級立場的「國際黨」，故其「不斷革命論」也是「世界革命論」。在革命策略上，中國托派認為革命高潮不是時時存在，在下次革命高潮來臨前的低潮期，應實行國民會議的革命路線。

第三節 學術研究現狀及本書努力方向

一、先行研究的回顧與評述

早在 1930 年代，已有人開始研究中國托派的歷史。1938 年，尼司撰成《陳獨秀所謂托派問題》的小冊子，可視為最早研究中國托派史的著作。該書作者可能是托派成員或同情者，他申明寫作此書是為陳獨秀洗刷清白，使世人「對托派問題有一種認識」。¹因大量引用文件、書信，故作者又強調該書實為編著。尼司梳理了托陳取消派形成的過程，以及 1930—1931 年的四派聯合走向統一的歷史，對托派的政治主張交代較為全面。重點論述陳獨秀在抗戰期間並非漢奸的問題，以及漢奸事件引起的政治力量互動。但作者「辯誣」心切，憤激之詞遍佈全書。同時作者沒有詳細考證相關史實，錯訛之處甚多。比如，他認為中共一大召開的時間是 1921 年 5 月，陳獨秀參加了此次會議；四派聯合時的力量從強到弱的排列順序是「無產者社」「十月社」「我們的話」「戰鬥社」；陳獨秀最後一次入獄，實際是中共所害等。該書流傳不廣，對相關研究推動較小。

托派人物鄭超麟曾於 1945 年撰寫《回憶錄》，其中第 12 章專講中國托派史。²在自序中，他強調自己記憶可能有誤，《回憶錄》不能算作「革

命史或共產黨史」。不過，他對中國托派早期的歷史敘述嚴謹且較完整，可稱得上「史」。該章闡述了中國托派四派統一前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觀點，對陳獨秀如何一步步走向托派、四派聯合時的人事關係，特別是陳獨秀與彭述之等人的關係敘述甚詳。鄭超麟強調中國托派雖然都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張，但各人的理解和注意點並不一樣，為後來托派不斷爭論甚至分裂埋下伏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隨着全國範圍內肅托運動的進行，托派在中國大陸成為反革命的代名詞。直至 1970 年代後期，中國托派都是理論批判對象和現實政治需要的攻訐目標，談不上學術研究。¹在此期間，中國台灣的學者開始了對中國托派史的學術探索。著名傳記作家、從大陸赴台的學者鄭學稼（1906—1987）較早地進行中國托派史的研究。在 1937 年末，鄭本人也曾被中共指稱為「托匪」，他為還原真相並「站在歷史研究者的立場」，於 1972 年寫就《所謂「托匪漢奸」事件》一書。²該書着重講述了中共肅托問題的來龍去脈，對中國托派的抗戰主張、「托派漢奸」事件的原因等問題亦有敘述。在闡明自己並非托派的同時，他強調中共肅托與蘇聯的動向存在直接關係。完成《所謂「托匪漢奸」事件》一書後，鄭氏一直細化托派研究。1989 年，鄭學稼又出版了篇幅宏大的《陳獨秀傳》，³內有幾個章節敘述陳獨秀從參加到離開托派的過程。因作者與陳獨秀在 1940 年前後有較密切的聯繫，該書也披露了一些重要史實。應予注意，這兩本書的缺陷是缺乏第一手史料，大篇幅引用回憶性史料，影響了可信度。

1 此種情況到 1978 年仍未改變。見梁其林：《兩代奸宄一脈相承——駁托派的「蛻化論」和四人幫的「走資派論」》，《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 年第 2 期；沙健孫：《打着「左翼反對派」旗號的極右派——十年內戰時期的托陳取消派簡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 年第 3 期。

2 鄭學稼：《所謂「托匪漢奸」事件》，台北國際共黨問題研究社印行，1976 年。

3 鄭學稼：《陳獨秀傳》，台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9 年。

1 尼司：《陳獨秀所謂托派問題》，新中國出版社，1938 年 5 月。

2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上），東方出版社，2004 年，第 321-344 頁。

上述成果兼具回憶與「辯誣」特性，加之作者均與托派有或深或淺的聯繫，立場鮮明，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研究的學術化程度。1979年，美國伊利諾伊州大學的 Joseph Thomas Miller 完成了博士論文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Trotskyism: The Role of a Permanent Opposition in Communism*（《中國托派政治運動：共產主義陣營內的持久左派》）。這是第一部以中國托派為中心的專門論著，立足政治史視角，作者對中國托派的主要政治活動均有論述，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西方學界論述中國托派的重要成果。該著作最大的不足是史料缺乏，很多問題難以展開，研究深度有所不足。這一情況也間接證明，海外中國托派史研究從開始即遇到史料缺乏的限制。恰在此時，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一些學者開始重視中國托派史的資料蒐集和研究，使得該課題的研究出現重大進展。

1980年代至1990年代前期，中國大陸學界出現較多關於中國托派史的學術成果，¹它們大體上呈現出兩種認識：一種觀點以劉志強為代表，用中國共產黨取得成功的歷史結果反證中國托派理論和路線的不正確，這有其內在邏輯性；²一種以唐寶林的觀點為代表，雖不能避免成王敗寇視角，但未糾結於對托派的批判，能深入到中國托派內部，梳理托派成員走向托派的原因及走向。³這兩種認識雖受到1950年代以來形成的某種狹隘政治觀念的制約，但均弱化托派是「反革命」的評價。

1 王藝琳：《陳獨秀與托派》，《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2期；唐寶林：《中國托派組織的歷史沿革》，《黨史資料》1981年第1期；唐寶林：《試論陳獨秀與托派的關係》，《歷史研究》1981年第6期；沙健孫：《托洛茨基反對派在中國產生及其破壞》，《黨史研究》1982年第2期；張君、唐寶林：《陳獨秀轉向托派和被開除出黨問題剖析》，《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2期；劉志強：《論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主張及影響》，《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王學勤：《陳獨秀與托洛茨基主義》，《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6期；孫茂生：《中國托洛茨基派的興衰》，《科學社會主義研究》1988年第1期；唐寶林：《簡論中國托派》，《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1期。

2 劉志強：《論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主張及影響》，《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3 唐寶林：《試論陳獨秀與托派的關係》，《歷史研究》1981年第6期；唐寶林：《簡論中國托派》，《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1期。

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的中國托派史研究呈現兩個特點。第一，與陳獨秀研究緊密相關。陳獨秀是研究中國近代史和中共黨史繞不開的人物，研究陳獨秀成為「顯學」，「陳學」之名也應時出現。據統計，1987—1994年的七年間出版的關於陳獨秀的學術專著達18種之多，平均每年2.5部。1993年一年發表的關於陳獨秀研究的文章就有35篇，月均三篇。¹而參加托派是陳獨秀政治生涯後期最為重要的政治活動，他是中國托派的首任書記，所以1990年前後在關於陳獨秀的研究成果中，相當一部分是後期陳獨秀和托派關係問題的研究，以後見之明看，是陳獨秀研究為中國托派史研究打開缺口並拓展了空間。第二，與現實政治緊密相連。1937年，隨着蘇聯全面肅托，托派在共產國際被打成「反革命」，各國共產黨均要配合肅托，托派由此也被指稱為「反革命」。在中國，在抗戰的大背景下，王明、康生等人指托派為「漢奸」，發起「肅托運動」，陳獨秀是這一運動的最大目標。1951年《毛澤東選集》對「反革命的托洛斯基分子」作的註釋為：「並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而是一夥無原則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僱用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²而這一新時期研究陳獨秀的人士或多或少都有為陳獨秀正名的心態，他們認識到為陳獨秀正名須從根本上證明托派不是漢奸反革命。1988年，蘇共中央政治局為托洛茨基平反，撤銷對其「反革命」的指控，這更加激勵了一些中國學者為托派正名的決心，從而加速了中國托派史的研究。

一定程度的學術積累，推動了中國托派史研究的整體展開，唐寶林的《中國托派史》（台灣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適時出現。該書撰成於1986年，是現今中國托派史研究的權威之作，代表着目前中國托派史研

1 謝偉：《漫談陳獨秀應開放禁區》，《陳獨秀研究動態》第2期，1994年11月，見原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善後小組2004年編印《陳獨秀研究動態》（合訂本，上、下冊）。

2 唐寶林：《中國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紀事》，《世紀》2002年第5期，第6頁。

究的最高水平。該書共分六章，依次為：風雨中孕育的怪胎、陳獨秀誤入歧途、四分五裂到勉強統一、夾攻中的顛仆與掙扎（敘述四派統一到抗戰前的托派史）、抗戰中亂彈琴、無可奈何花落去（探討 1945—1952 年的托派史）。每個章節名字可視為作者對托派相應時段的結論。唐寶林總的結論可用書中最後一句話概括：「中國與世界發展的趨勢，與他們追求的目標越來越遠了。」這是總結 1952 年後海外中國托派的話。唐寶林對中國托派從開始到結束的評價也大致如此，即中國托派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中國托派史》有兩大優點：第一，史料翔實。因遇到 1980 年代初相對寬鬆的檔案管理環境，加之個人機緣，唐寶林得以看到比較全面的公安部所藏中國托派檔案。¹ 充足的史料使得作者能夠比較充分、可信地論述問題。第二，對中國托派的史實敘述較為全面。作者從莫斯科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產生講起，直至 1952 年 12 月中國托派在大陸被取締，對在此期間中國托派發生的主要事件均有介紹，甚至對中共肅托運動中的系列冤案「俞秀松案」「張慕陶案」「王公度案」「湖西事件」「王實味案」等也有較詳細交代。

不可否認，唐著《中國托派史》也存在問題。首先，由於時代局限，作者對中國托派史的認識難以做到全面客觀，對托派做出的評價不免過低。比如，他認為托派是「風雨中孕育的怪胎」，在抗戰中實際上做了有利於日本侵略者的事。這一結論易引起爭議，尤以原中國托派成員的抗議為最。該書問世後，健在的托派老人「一致地」指認這是「反托的書」。鄭超麟甚至認為該書存在以成王敗寇著史及一些史實不確切的問題，是歷次「反托運動」的餘波。² 原托派成員是利害相關人，渴望托派被肯定，反對唐寶林的觀點也在情理之中。不過，唐著在評價托派的全部

歷史時，的確存在不足或有欠客觀的方面。作者本人後來也反思《中國托派史》對托派評價偏頗的問題，認為中國托派史應進一步深入研究。¹ 其次，《中國托派史》主要講中國托派的興起，發展過程及在大陸的衰亡過程，一定程度上說主要是中國托派的組織變遷史，缺乏對中國托派的核心觀念、理論主張及政治訴求的深入探討。另外，該書也存在一些史實上的問題，唐寶林後來也在不斷加以修正，如書中介紹 1935 年 1 月陳獨秀被托派中央開除，後在其《陳獨秀全傳》中則改為「差點被托派中央開除」。²

原托派成員劉平梅不滿於唐寶林的《中國托派史》，他認定「不滿意不如自己寫一本，用我們掌握的事實說話」。³ 他晚年一直忙於撰寫《中國托派黨史》，並於 2003 年在香港出版。劉著主要依靠托派老人回憶及部分托派文件撰成，目的是修正唐著《中國托派史》。⁴ 該書共分十二章，依次為：在聯共（布）黨內爭論中形成中國托派組織——中國托派組織的產生；中國四個托派組織與統一大會；中國托派作出反日、反對國民黨不抵抗日本侵略而攻打中國共產黨的決議，中國托派提出與共產黨合作抗日、反蔣；北方區委分裂及上海法南區委反對中央事件；托派機關再次遭到破壞，托派案的公開審判；組織危機；抗戰時托派組織的發展及抗日活動，各地方組織的建立和抗日活動；陳獨秀出獄後的政治活動與政治見解，中共誣告「托派漢奸」，陳獨秀與「托派中央臨委的爭論」；中國托派組織的分裂；內戰時期；共軍打敗國民黨軍，托派中央對局勢估計錯誤；遷移於香港的托派組織。該書站在托派立場，對該組織的史實交代較為完整，同樣可稱為托派組織發展史的著作。《中國托派黨史》

1 「唐寶林訪談錄」，孫會修記錄，2014 年 3 月 17 日於北京唐寶林家中。

2 唐寶林：《陳獨秀全傳》，第 751 頁。

3 段躍：《托派老人劉平梅》，《炎黃春秋》2008 年第 6 期，第 67 頁。

4 劉平梅：《中國托派黨史》，新苗出版社，2005 年。

1 唐寶林：《陳獨秀全傳》「繁體字版前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

2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下），東方出版社，2004 年，第 358-368 頁。

在一些具體的組織活動上比唐著《中國托派史》講得更為詳細。如對北方區委分裂和法南區委反對中央事件、托派的各地方支部活動、托派參加抗日活動等，都有較詳細交代，彌補了唐著《中國托派史》之不足。劉著《中國托派黨史》突出的問題是完全站在托派立場，重點論述托派理論的合理性，以及托派在抗戰中做出的成績和遭受的苦難。同時，作者對托派熾熱的情感貫穿全書，使該書缺乏史學著作應有的規範性和專業性。

唐劉之爭本質反映了如何評價托派價值的問題，學術界也意識到應重新探討中國托派的歷史定位。日本學者較早進行該方面的論證。菊池一隆認為，托派事實上承擔了城市革命的任務，與中共的農村革命是互補的關係。¹另一日籍學者緒形康則呼籲，要重新評估中國托派在社會論戰中的影響。²

系統肯定托派歷史價值的是英國漢學家 Gregor Benton（班國瑞），他的著作 *China's Urban Revolutionaries: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otskyism, 1921-1952*（《中國城市革命者：中國托派的歷史探索（1921-1952）》）³ 是歐美學界關於中國托派史最為重要的研究成果。班國瑞與托派老人王凡西有良好的個人友誼，王把自己蒐集的托派史料多給了班國瑞，一定程度彌補了歐美學者研究中國托派史存在的史料不足問題。班國瑞以城市革命路線闡釋整個托派的歷史，認為中共從成立至大革命結束一直走城市革命道路，大革命失敗使其內部出現分化，托派一直堅持走城市革命路線。班國瑞並沒有着力於托派組織的演變和發

展，他以概念史的研究方法，透視托派關於「國民會議」「中國社會性質」「不斷革命論」等主張，肯定托派的民主追求，認為如果托派不被中共開除，托派的國民會議主張和黨內民主訴求會挽救中共走出困境，是一連串的外在政治打擊和迫害，扼殺了托派主張實施的可能性。彭述之等人推行的斯大林式的官僚主義又使托派走向分裂。班國瑞是較為左傾的學者，這也是其能與王凡西交好的原因之一。該書總體上較為瑣碎，結論上略偏向於托派的少數派。

新千年前後的一段時間，隨着老一輩學者逐漸退隱，中國托派史的研究出現斷層。原有史料沒有得到傳承，新的史料有待發現，零星發表的關於中國托派史的文章難見新意。比如，在較為重要的成果中，胡明的《陳獨秀「托派」問題始末》和祝彥的《關於中國托派的幾個問題》，均沒有超過 1980 年代的研究水準。¹

近些年，有研究生把中國托派作為自己學位論文的研究對象，試圖對中國托派史研究有所推進。他們受新時代的學術訓練，較少受絕對化的意識形態影響，對托派的全面評價逐漸增多。鄭坤騰的碩士論文《荒溼的革命之路：中國托派的不斷革命論與革命抉擇（1925-1952）》（台灣大學 2008 年碩士論文）認為「輕易忽略托派思想的合理性將是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項重大損失」。在作者看來，托派失敗的原因是其試圖將俄國城市革命的經驗全面移植到中國。該文比較出彩的是第一章。作者以托洛茨基的核心觀點「不斷革命論」為中心，用較大篇幅梳理了「不斷革命論」從馬克思到托洛茨基的理論淵源，認為托洛茨基理論是一種自然發展的革命邏輯。但囿於台灣缺乏托派史料，第二至第五章（革命性質爭議與中國托派的產生、中國社會史論戰、陳獨秀與托派、革命

1 [日] 菊池一隆：《論中共與托派的互補性（簡綱）》，《陳獨秀研究動態》第 9 期，1996 年 11 月。原載日本《史林》第 79 卷第 2 號，1996 年 3 月。

2 [日] 緒形康：《30 年代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重新評估》，《陳獨秀研究動態》第 8 期，1996 年 7 月。見合訂本，第 108 頁。

3 Gregor Benton: *China's Urban Revolutionaries: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otskyism, 1921-1952*, Humanities Press New Jersey, 1996. [《中國城市革命：中國托派的歷史探索（1921-1952）》，新澤西人文出版社，1996 年。]

1 胡明：《陳獨秀「托派」問題始末》，《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3 期；祝彥：《關於中國托派的幾個問題》，《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14 期。